

对草原文化生态文明的浅析

张燕¹，千布拉格²

(1. 内蒙古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2. 内蒙古工业大学，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80)

摘要：草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尊重自然、崇尚自然的文化。一直以来，主要从事游牧业的马背上的民族都与自然界高度的和谐的相处，这对于现在我们应对的生态危机的全球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草原文化；生态价值；生态恢复；和谐发展

中图分类号： G127 **文献标识码：** A

草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主要从事游牧业的马背上的民族都与自然界高度的和谐的相处，这对于现在我们应对的生态危机的全球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树立科学发展的观点，并且践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因地制宜，才能重新修复和构建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一、草原文化的生态内涵

在中国北疆辽阔的内蒙古高原上，生活着一群勤劳勇敢的马背民族。他们世代繁衍生息，在长期生产和实践的活动中不仅创造了绵延千年的游牧文明，而且创造和发展了光辉灿烂的草原文化。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近代考古已经发现，早在公元前 6000—公元前 2000 年，内蒙古高原也曾存在着原始的农耕文化，如兴隆沟文化、赵宝沟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朱开沟中上层文化等。根据这些考古发现和中原地带考古发现的相似性，有些人类学家推测，有可能相当一部分先民都来自这一地区。考古文物的发现也比较充分的证明，人类先民的迁徙与交流是极其频繁的。草原文化因此与长江文化、黄河文化共同组成了博大精深、丰富多样而又充满活力的中华文化。

牧业文化成为北方草原的主导文化，大约在公元前 16 世纪左右。游牧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也是草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游牧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创造了自己的文化——草原文化。自从它诞生之后，其顽强的生命力绵延不绝，生生不息，并且成为北方草原最具代表性的文化。

草原文化是马背民族共同创造的。在古代北方草原上曾经出现过西戎、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等多个少数民族。不同的游牧文化以其自身鲜明的特色和丰富的内涵，对中原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古代的历史变迁，是在黄河文化和草原文化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两种文化的碰撞在带来战争和割据的同时，也促成了融合和统一。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主脉，就是在以上两种文化的对话中延续的。

游牧文明的特点之一，就是对自然的高度依赖性。由于内蒙古高原地处北半球中纬度地区，处于亚洲大陆中部略偏东。气候上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特殊的生态地理环境，决定了草原文化的自然性和生态性。马背上的民族以畜牧业为经济支柱，饲养马、牛、绵羊、山羊及骆驼，生产方式是逐水草而游牧，对草原生态环境依存度非常高。马背民族的游牧生产并非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么简单落后，而实际上与农业生产一样包含着复杂的技术要求。草原游牧活动是遵循着自然规律而进行的周期性、循环性的科学运动，能够保障草场的均匀利用和均匀施肥，保障草场、牲畜和人类的健

康，有力地阻止超载过牧、乱砍滥垦和生态环境恶化的发生。游牧生产方式把人—畜—草的关系转化为动态平衡，使三者变动状态中追求草原生态系统的整体效应，从而实现草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思想是草原文化的精髓。马背民族在长期的游牧活动中逐渐认识和感悟到，草原是一个系统的、复杂的、相互关联的大系统。北方游牧民族普遍对大自然有一种崇拜的心理，他们主要信奉萨满教。萨满教是一种原始的宗教形态，主张“万物有灵论”，主要崇拜自然、天神和祖先，认为草原上的一草一木、飞禽走兽、河流湖泊都有灵性和神性，不能轻易的扰动、捕杀和破坏，否则就会受到神灵的惩罚。不仅如此，他们生活习性的细微之处也凝聚着生态之魂，体现着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深层关怀。在蒙古民族的日常生活中，牧人们不会因为自身利益或生活的方便而去破坏自然。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蒙古包是人类长久性住宅建筑中用材最少、建筑方式对自然界破坏性最小的建筑；牧人用于取暖和炊事的燃料是牛羊粪和枯树枝，禁止砍伐树木；同时他们严禁在河水、湖泊中洗涤污物及便溺。这种生活方式看似简单，但是这种简约生活方式的背后，实际上蕴含着对自然能量的节约机制，闪烁着宝贵的生态之光。

草原文化对生态的保护思想是理性的，它注重通过社会规范约束人们的行为，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生态观，进行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在蒙古族的历史上，有过多部保护自然资源的法律法规。其早期的习惯法规定，严禁挖掘草地、遗火、春夏季狩猎和污染水源等行为。元代以后形成的所有成文法几乎都涉及到了生态问题，对蓄意破坏草场、盗猎等行为指定了严厉的制裁法规，《元典章》、《阿勒坦汗法典》、《喀尔喀法典》等还列出了保护动物的名单，反映了蒙古民族高度自觉的生态保护意识。

总之，草原文化是一种生态的文化，是一种尊重自然，崇尚自然的文化。

二、现代工业文明对草原文化的影响

随着近代工业革命的兴起和发展，人类逐渐步入了工业乃至后工业文明的时代。工业文明的到来实现了人类由简单手工劳动到大机器生产的转变，直接依赖自然能量到开发利用自然能源的转变。在不到两百年的时间内，人类成功的完成了从蒸汽时代到电气时代直至信息时代的跳跃。工业文明以前所未有的强大加速力量，推动着人类历史前行的步伐。但是工业文明在给人类带来舒适生活的同时，也埋下了人类文明的危机和隐患。工业文明的巨大成果使人们乐观地认为，现代人完全有能力征服和控制自然，于是开始了对自然资源毫无节制的开发和掠夺，对自然界进行无情的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被打破，人类在浅尝经济增长的甜蜜之后，开始无奈的自食接踵而来的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后果。

草原文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由于农业生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原始的游牧的生产方式被迫改变，集体的牲畜也随之承包到户，大牲畜的数量有明显的增长，养畜缺草的矛盾日趋尖锐，严重阻碍畜牧业的发展。同时，农耕文化的发展也在向草原要地，大批优质草地被开垦，草原最原始的放牧功能在逐渐退化，本身脆弱的草原环境加速了其荒漠化的进程。再加上现代城镇化的步伐加快，大部分原始的牧民开始放弃游牧的生活，离开草原，原本草原上形成的人与草原和谐相处的理念和模式已经不复存在，人对草原的那种崇拜与敬畏的精神正在消失殆尽。这对草原文化的发展无疑是十分不利的。除此之外，还有以下许多问题亟待解决：

第一，草原文化生态环境的保护理念已经确立，但是保护的方法和措施缺乏可持续性。在草原生态治理的思路和方向问题上，目前还存在草原生态治理政策综合性、整体性、全局性特点不强，还存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走一步看一步”的倾向，政策预期和项目前景不明确。草原生态治理缺乏长期、可持续性制度和休禁牧制度等，且草原生态治理方式都有一定期限和范围。同时，在制定政策与项目时，往往优先考虑了以草为本，以草和畜为出发点和着力点，却偏偏忽视了人的主体地位，以致政策和项目常常得不到牧民群众的支持。

第二，牧民的科学技术水平亟待提高，经营性问题亟待解决。草原家庭承包到户实行后，牧民也面临着生产和生活上的经营性、技术性难题。尤其是纯牧区，当地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就业机会少、收入渠道窄，牧民的收入几乎全部来自草原畜牧，在这种条件下，牧民现有增收致富，又无其他科学技术指导，只能靠多养牲畜来提升效益。同时，随着近年来牧区和外界沟通的增强，牧民的交通、生活、通信、教育等成本日益上升，也需要牧民从有限的草地上获取更多的收益来维持现今的高消费，这样必然导致草原上不堪重负，致使草场退化，生态环境恶化。

第三，草原监管权力亟需加强，而且监理经费不足。由于草原监管机构位势低，草原监理部门在执法方面存在很大困难，在处理草场纠纷、工业征用等问题时，往往执法能力弱，缺乏地方政府的大力配合，无法完成执法任务，或听之任之。同时，由于经费不足，草原治安派出所、草原经济民警队缺乏必要的执法设备，执法过程中取证困难，制约了执法工作的正常开展。

这些问题都是新形势下草原文化面临的和亟待解决的问题，都关系着草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从传统的草原文化中我们可以汲取一些宝贵经验。

三、草原文化对人类的启示

草原文化源远流长，其生态价值的内涵到现在也是宝贵财富。草原文化不仅仅给我们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产，在当今生态环境面临全球性危机的情形下，更为我们开启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思路，新模式。

(一)要充分尊重自然规律，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树立生态文明的自然观。

草原文化中的依赖自然、适从自然的自然观告诉我们，大自然中的一切有机、无机、有无生命的事物都与人有某种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前提。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草原文化中，自然观只能以特定的、适用的形式寄存于其他文化形态之中。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不变的观念与不断变化的表现形式之间必然会发生冲突。为了使这种优良的自然观永远成为人们自觉的理念和行为，就必须寻找一种现代存在方式——生态文明的自然观，使之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不断得到更新与完善。因为旧俗的消失需要新方式的代替和填补，新方式的推进需要有效的办法和措施。

在生态文明的自然观中，人对自然的态度应是“师法自然”。这个“师法自然”既不意味着我们像古代游牧民族那样对自然心生恐惧，盲目膜拜，也不意味着我们在工业时代一味地想征服自然，战胜自然，做自然的主人，而是人与自然结盟，二者相互合作，相互关照，人类利用、保护、建设、改善自然，自然哺育、给予、奉献人类。人与自然间的物质、能量、信息的输入、输出必须保持动态的稳定和平衡，不出现一方对另一方的盘剥和掠夺，二者友好联盟。在这一点上，草原文化中的自然观具有跨时代的启示意义。

(二)在人和自然界之间寻求一种动态平衡，不断提高生态力，构建绿色发展模式，实现生态现代化。

所谓生态力是指生态系统服务的能力，即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服务的能力，其状况直接和间接地影响和决定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的发展方向。游牧民族非常注重自然的本来样子，他们生存的前提就是包括草地在内的整个生态系统的自然平衡。在游牧人的头脑中有了这种意识前提下，在其意识形态领域里，便产生和发展了独特的“保护重于建设”的草原生态保护思想，因此，他们的生产是一种具有较高生态力的生产。具有较高生态力的游牧生产与今天工业化过程中“先污染，后治理”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今天，正在关注草原生态保护的人们应从中有所感悟和启发。要提高我们的生态力，就要构建绿色发展模式，通过发展绿色科技、绿色生产力、环境保护和环境友好技术、绿色产品和绿色服务、绿色营销以及倡导以绿色生活方式、绿色消费方式、绿色行为方式等为内容的绿色精神文明，实现生态现代化，即在社会整体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将生态环境作为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变量，将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的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确立科学的生态观和现代化发展理念，

建构有利于人和生态环境共存共荣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达到人类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目的。

(三) 保护改善生态环境，应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生态恢复自然性相结合。

所谓生态恢复就是使受损害的生态系统从远离其初始状态的方向回到被干扰、开发或破坏前的初始状态。按照生态学原理，物种多样性才能使生态具有稳定性，单一物种将使生态系统更加脆弱，更不稳定，一旦某一部分物种劣化，整个生态系统将走向崩溃。在物种多样性的建设方面，自然界做得是最好的，而且是免费的，即自然的恢复更重要、更关键。因此，我们认为，生态恢复的作用要远远大于生态建设。从结果看，游牧人这种适从自然的自然观确实有助于整个草原生态系统的恢复。但从另一方面看，这种生态平衡是靠人对自然的顺从、迎合来维持的，是靠限制人的主体性来换取的。它一味地要求人消极被动地顺应自然的变化，把人过分自然化，压抑了人的智慧，阻碍了人的创造性的发挥，限制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本质力量的发展。在生态文明建设日益明确的今天，就要站在整个生物圈立场上，弘扬草原文化中生态恢复的思想精华，同时，发挥现代工业文明中的科学思维、逻辑严密的方法论，使人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聪明才智，对生态环境适当地干预，才能履行好生物圈的维护者、管理者 and 建设者的责任。

草原文明作为一种绿色文明，我们应该弘扬；草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部分，我们应该继承，不断地形成一种绿色的价值观，以促进草原生态文明建设，加快草原生态恢复和改善步伐，使草原踏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对于我们今天应对生态危机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 [1] 陈寿朋. 草原文化的生态魂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7.
- [2] 田广金, 郭素新. 北方文化与草原文明 [A].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 [C].
- [3] 盖志毅. 制度视域下的草原生态环境保护 (汉) [M].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8.
- [4] 康俊霞. 草原生态恢复与可持续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J]. 现代农业科技. 2010, (5).
- [5] 马桂英, 王鸿升. 草原文化的自然观及其启示——从环境伦理哲学视角审视 [J].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04, (5).

On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of Prairie Culture

ZHANG Yan¹, QIAN Bulag²

Abstract: Prairie culture is the cradle of Chinese nation, and it is an important part in Chinese culture. Prairie culture is a kind of respect for nature and the advocacy natural culture. All the time, the nation that engaged in nomadic horseback is living together in harmony with the nature. That is very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us to cope with the ecological crisis of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 Prairie culture; Ecological valu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Harmonious development.

收稿日期: 2012-04-12;

作者简介: 1. 张燕 (1987), 女, 汉, 乌兰察布市人。内蒙古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 2010 级在读研究生, 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面的学习与研究; 2. 千布拉格 (1975), 男, 蒙古族, 鄂尔多斯市人。内蒙古工业大学电力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工作, 内蒙古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 2010 级在读研究生, 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面的学习与研究。